

传世散文精品库

知古明道

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散文集

主编 堵军



延边人民出版社

传世散文精品库

知古明道

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散文集

主编 堵军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古明道/堵军编. -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9

(传世散文精品库)

ISBN 7-80698-293-0

I. 知… II. 堵…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133 号

责任编辑:崔承范

装帧设计:魏 红

传世散文精品库

知古明道——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散文卷

堵 军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http://www.ybcbs.com>.)

北京市通州区皇家印刷厂印刷

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数:0001—5000 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59 印张 315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8-293-0/I · 34

定价:389.00 元(全 14 册)

本卷定价:27.8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同诗歌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出版这套“传世散文精品库”。

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始于先秦，下迄于清末。各类作品均单独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

本丛书与以前的选本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原文的选择上，选得比较全面、科学，充分考虑了当代读者的审美情趣，体现了“大散文”的概念；二是在体例上，从读者学习和鉴赏的实际出发，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所以每篇原文之后，都有简明扼要的注释、准确的译文和精美的赏析，使读者不仅能读懂原文，还能从原文、译文和赏析中获得多重的艺术享受，并且每本书都

有原文作者的简介，可以使读者对各大名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三是各本书的编著者都是当今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们以渊博的知识，严格的眼光，科学的治学态度，完全保证了本丛书的内容质量，使本丛书成为“信得过产品”。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当今名人选编、注译并赏析古代名人名作的成功之作。

我忝为本丛书的主编，面对各位前辈的书稿，常被各位前辈谦虚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赵朴初、谢冰心、启功、夏衍、叶至善、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等八老提出的《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深感本丛书各本书的编著者与赵朴初等八老一样，都有一颗热爱中华文化，要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传给青年一代的滚烫的心，这尤其令人敬佩。

古人散文，多览物抒怀。故欣赏佳文，不仅可见锦丽江山，享卧游之乐；同时，还可知古同人之心，作世事之观。然而，古今易代，时移事迁，江山更秀，岂可以今人之心，作往古之幽思？思古人之怆然，惜今人之怡乐，不仅可作今昔对比，亦可激发斗志，再造山河，为后人之思我者，作一导游者焉。故选此编，并为序。

编 者

2004年8月

曾巩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人。祖父曾致尧仕至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右谏议大夫，追封密国公。父亲曾易占，历知如皋、玉山，赠光禄卿，追封鲁国公。

曾巩自幼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二岁能文，落笔惊人。十六、七岁时，已通读六经，立志成为优秀的古文家。年未二十，已名闻四方。景祐三年(1036)，十八岁的曾巩赴京赶考，名落孙山，但结识了来京游玩的王安石，两人成为密友。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欧阳修十分惊奇，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然而，庆历二年曾巩再次落榜而归，欧阳修作《送曾巩秀才序》予以抚慰、勉励。面对家乡人的冷嘲热讽，曾巩并未消沉，而是力学不止。由于欧阳修的延誉，曾巩文名大盛，“由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林希《墓志》)，“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这期间，

曾巩多次上书欧阳修，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并推荐王安石、王回、王向等人。曾巩与王安石之间诗文寄赠相当频繁，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表现了真挚的友谊。

由于家事拖累和身患疾病，十五年中，曾巩一直未能再参加科举。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任主考官，大胆革除科举积弊，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曾巩与弟弟曾牟、曾布、从弟曾阜和妹婿王无咎一行全部考中进士。嘉祐三年，曾巩任职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司法参军，负责办理一州的刑法事务。五年，由欧阳修保荐，被召入京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到熙宁二年（1069）自求外任止，曾巩在京城生活了大约九年时间，先后校定古籍十数种，如《战国策》、《新序》等等，所作序文历来评价很高。熙宁元年，入充英宗实录院检讨官，不足一月即罢去。

熙宁二年，曾巩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在州治和救济灾民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四年，改知齐州（今山东济南）。齐州盗贼、恶霸横行，曾巩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制裁，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这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高潮，曾巩对新法虽有异议，但对其合理部分却能认真执行，灵活掌握，推行农田水利、募役、保甲、青苗等法收到很大实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斐然，曾巩深受齐州百姓爱戴。后来，齐州百姓在千佛山上修建曾公祠，刻石像纪念他。六年夏，徙知襄州，亦有平反冤狱的德政。九年，改知洪州（今江西南昌），遇瘟疫流行，曾巩迅速采取

一系列应急措施,对患病军民进行救助,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十年,授直龙图阁,移知福州军州事,兼福建路兵马钤辖。福州佛教盛行,寺庙占地严重,一些上层僧侣贿赂官府,谋求私利。曾巩对佛院住持制度进行改革,以选举制取代延聘制,杜绝了僧侣的钻营行为。又废除不法寺院,逮捕违法恶僧,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此外,福建路治安很乱,曾巩在治内恩威并施,措施得力,使福州治安大为好转。元丰元年(1078),召判太常寺。曾巩北上至江宁府(今南京市),却接到朝廷要他改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命令。二年正月,曾巩到明州上任。仅过五个月,又徙知亳州(今安徽亳县),七月到任。亳州属地也多有盗贼,曾巩推行保甲法的成功经验,使亳州的社会治安很快稳定下来。同时,他对州县公文表报制度进行了改革,改变公文表报繁多的现象,又整肃了官僚机构的办事作风,使办事效率大为提高。

元丰三年,移知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十月途经京都开封时,受到神宗召见。神宗对曾巩的才干、学识大加赞赏,把他留在三班院供事。四年七月,曾巩被任命为史馆修撰,专典史事,负责修撰五朝史事。然而,由于某些人的扶私报复,加上曾巩所撰写的《太祖皇帝总叙》不合神宗之意,结果五朝国史未能成书。不过,曾巩将搜集到的史料以会要体编撰成《隆平集》二十卷,成为《宋史》、《通鉴》的资料来源之一。五年四月,曾巩官拜中书舍人,并负责官制更改工作。不久,卧病不起。六年四月十一日,

曾巩在江宁府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南宋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年谱共有七种：宋朱熹《曾子固年谱》一卷（已佚），清姚范《南丰年谱》一卷、孙葆田《曾南丰年谱》一册、杨希闵《曾文定公年谱》一卷，近代王煥镛《曾南丰先生年谱》、周明泰《曾子固年谱》，以及《曾巩家系图并年谱》（阙名）。此处作品系年据周谱。

曾巩是一个尊道崇儒的古文家。明宁瑞鲤《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云：

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軻氏以后，未有臻斯盛者也。

这一评价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曾巩自幼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家世为儒，故不业他”（《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他相信“经者乃万世之法”（《黄河》），“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上欧阳舍人书》），因而能自觉遵守孔孟之道，并以之为依据，来研究现实问题。他常常在文章中直接引用六经语句，或予以发挥，于是有人说“其《元丰类稿》言近指远，大者衷于谏训，而小者中于尺度。至论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及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六经。”（赵师圣《曾南丰先生文集序》）曾巩道统观念极强，强调“学有统”、“道有归”（《新序目录序》），对于违背儒家思想的学说一概明确加以反对。例如，在《梁书目录序》、《分宁县云峰院记》、《莱园院佛殿记》、《鹅湖院佛殿记》、《兜率院记》、《说非异》等文中，出

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对于佛门“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却大肆浪费国财民力以兴建宫殿的现象给予批判，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佛教徒本身：

有卑世主、轻海内之实，盛从诡譎菟琐恣睢之邪情，驰骛祲祥倾荡怪神之邪说，离君臣，叛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务，髡而缁，不脩不嗣，辟而无用。（《说非异》）

又云：

浮屠利心无足，而假无欲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淡泊也。（同上）

措辞十分激烈。曾巩还辟道教，如《仙都观三门记》等，但态度相对和缓得多，只是据经义指出其不合儒家礼制之处。此外，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刑、名、兵家之术，则狙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难怪明代方孝孺说：“子固伊尔儒者，故其文粹白纯正，出入礼乐法度中。”（《逊志斋集》卷十二）

曾巩涉猎极广，所谓“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镌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兵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南轩记》），都曾研习。《类要序》一文也主张学者要涉猎百家，拓宽知识面。但正如曾巩自己所说：“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即始终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因而，他强调写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要“当于理”（《王子直文集序》），并以此衡量天下文章。突出的例子

是他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批评。他从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史记》，认为其“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南齐书目录序》）对当时人，他称赞孙都官的文章“其归要不离于道”（《答孙都官书》），而对李沿不重视义理、“汲汲乎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答李沿书》）。

曾巩散文还体现了宋学对汉学的批判。“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引《国史》），曾巩却不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与杜相公书》），他所担忧的是“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一发之系千钧”（《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自认“迂阔”而不悔。他批判汉学，指责汉代经生“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对能破去百家传注、回复先王之道的学者大加推重。如《王深父文集序》：

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

而曾巩对扬雄的推尊，也与扬雄冲破当时章句笺注之学而务明儒道颇有关系。曾巩常常论及性理，于是很为一些理学家所推崇，如朱熹自称“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之文，而窃慕效之”（《朱子文集·跋曾南丰帖》），而有些人甚至说曾巩“首明理学”（元刘壘《隐居通议》），“其文当濂洛未兴之先，已能开性命之宗，无事理之障”（明艾南英《易三

房同门稿序》，《天佣子集》卷二），“实开南宋理学一门”（清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等等。这当然也有些过当。曾巩所讲的“性理”并未超出传统儒家学说的范围，与理学家们所讲的“性理”有很大的区别。但他在文章中常常发挥经旨，也确实为宋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曾巩比起宋初一些单纯以儒学相号召的古文家来，他的文章具有更强烈的政论色彩，包含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早在未中进士以前，曾巩就多次上书范仲淹、杜衍、欧阳修、蔡襄等陈述当时的急务，讨论宰相、谏官的职责等等，并多次推荐王安石。他于皇祐元年撰写的《本朝政要策》五十首，系统地考察了宋朝考课、训兵、边余、贡举、佛教、契丹、刑法、水利等等五十个事项，涉及到政治、军事、教育、宗教、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展示了他较广阔的政治视野。曾巩深受欧阳修根于早期儒学、注重经世实用的思想的影响，吸取了早期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因而十分关注民生疾苦。他认为人民的福祸是人君决定去取的唯一准则，并认为自古以来“未有民富且安而乱者也。其乱者，率常民贫而且不安也”，主张削减“靡靡然食民之食”的兵、佛、老（《上欧阳舍人书》）。入仕以后，曾巩对时政和民生的关心有增无减。在一些送人出任地方官的赠序如《送江任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送蔡元振序》等都勉励他们恪尽职守、造福百姓，显示了对吏治的重视。对已有出色治绩、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如

丁瑛),曾巩自称“爱之特深”,在屡屡拒绝求文者的同时,却因为丁瑛调任而主动作了《送丁瑛序》。在他自己出任地方官时,更是身体力行,打击豪暴、平定盗贼、兴修水利、减赋赈饥、储药救疫等等政绩,都可以见诸记载,可谓能言能行。他的一些文章写得不厌其详,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广德湖记》等等,是因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对国计民生来说十分重要。《救灾议》一文被叶适批评为“何至愚迫繁缕如此”,岂不知曾巩如此不惮辞费,乃是出自对民生疾苦的真切关怀。曾巩对时政和民生的关心贯穿在许多文章中,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入世精神。

曾巩还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他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说:

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

他在为赴外任的官员所作的赠序中都要勉励他们致力教化。他认为“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王子直文集序》),国家就容易治理。因而曾巩很提倡办学,《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等文对此都有所阐发。而从自身修养的角度出发,曾巩遵循《大学》“修齐治平”的规律,十分重视治学。他曾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全面陈述对治学的见解。《熙宁转对疏》云:

《大学》所以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谓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焉。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也专门陈述“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的道理。“先觉”之后，则有“觉斯民”的责任。致力于治学和教化，正是大学之道的两个阶段。重教化则轻刑政。如《刑赏论》主张行舜时“忠厚之教”，主张薄刑。《叙盗》主张“待教而诛”，反对“不待教而诛”，《洪范传》亦云“教之不率，然后刑之”。这是曾巩继承儒家仁政思想的表现。

曾巩时时称引先王之道，但又认为后世并非不可以有所损益。他在《洪范传》中提出“有常有变”的命题。《礼阁新仪目录序》一文更是直率地说：

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

《为治论》亦有类似的思想。此外，他在《唐论》、《唐令目录序》等文中对贞观之治的赞赏、叹慕还表明他有法后王的思想。然而，曾巩的变革要求是有限的。法可变，道不能变。《战国策目录序》中有这样的著名论断：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从这可看出曾巩的根本立场。熙宁间，曾巩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议，终于导致这对密友的疏远。

曾巩虽强调创作要尊经明道，但又主张文道并重。在这点上，他既不同于深受纵横家思想影响的苏洵、苏轼的离道为文，也不同于王安石的以治教政令为文。他宣扬传统儒家之道，依据经典来论述现实问题，又不同于二程专

谈性理之学，作哲学思辨。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强调作者必须“畜道德而能文章”，二者不可偏废。重道者易于轻文。而曾巩对于那些虽不合道却极有伟辞的文学家还是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给予相当的肯定，如对李白：

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隳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李白诗集后叙》）

他认为司马迁“亦不可不谓隳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南齐书目录序》）。此外，曾巩还用“伟丽可喜”、“闳深隳美”等语评文，可见他对文辞还是相当重视的。曾巩主张文道并重，实为清代桐城派“义法论”的先导。

宋代以来，关于曾巩散文风格的说法很多，比如：“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宋史》本传）、“衍裕雅重”（宋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纤徐委曲”（宋吕本中《童蒙诗训》）、“简严静重”（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十四）、“峻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密而古”（宋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三十一）、“古雅”（元金履祥《三苏文范》卷首）、“自然”（元刘壎《隐居通议》卷十八）、“敦厚凝重”（明郑瓊《井观琐言》卷一）、“典重醇深”（明艾南英《易三房同门稿序》）、“醇厚”（清吴振乾《唐宋八大家类选序》）、“柔美”（清姚鼐《复鲁絜非书》）、“温而定”（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目录序说》）、“尔雅深厚”“柔婉”（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平易”（清林纾《春觉斋

论文》)等等。概括起来,曾巩散文的主要面貌是典重而平易、含蓄而峻洁。然而,曾巩早期文章却另有一番面貌,宋代王震在《南丰先生文集序》中说:

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慄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扶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

欧阳修则在《送吴生南归》一诗中提到了对曾巩早期文风的改造:

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后来曾巩在任太平州司法参军时,又受到知州张伯玉的影响,于是文风逐渐变得简洁平易起来。不过,曾巩投拜欧阳修(庆历二年)之前的文章所存无几,使我们难以体会到欧阳修、王震所说的早期文风的特点。然而,曾巩后来的文章也并非都很简洁,某些篇也残留着喜好铺叙的毛病,如《太祖皇帝总叙》一文,神宗看了,不高兴地说:“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徐度《却扫编》)另外,清代魏禧也认为曾文有些“恣漫”,王夫之甚至批评曾文:“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蘅斋诗话》卷二)这当然就过于夸大其辞、以偏概全了。

曾巩散文在当时就很受推重,除欧阳修、王安石外,梅尧臣、苏轼、苏辙、陈师道、吕南公、秦观等等对曾文也都评价很高。降及南宋,曾巩散文依然影响很大。朱熹喜读

曾文,年轻时常常加以效慕,又说“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还特地为曾巩作年谱。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引》云:“今观朱子之文,波澜规矩似亦从南丰来。”吕祖谦在编选《古文关键》时,取曾巩而不取王安石。元代刘壎自称“特嗜”曾巩散文(《隐居通议》)。元末明初人朱右(字伯贤)首定“唐宋八大家”之目,编选《八先生文集》(已佚),确立了曾巩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以及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更是把曾巩奉为主臬。《元丰类稿》在明代至少刊印了十六次,唐顺之编纂的《文编》、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都选入了曾巩的作品。清代刻本更多,许多人将模仿曾巩散文作为入门途径,评价时人的作品也往往以欧、曾为标准。当然,由宋至清,也有过一些贬抑曾巩的评论,如叶适、屠隆、袁宗道、王夫之、袁枚等等,但不成主导。

然而,“五四”以来,随着桐城派末流被打倒,备受桐城派推崇的曾巩也受到冷落。解放前出版的十多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或不提曾巩,或只提名,未加论述。只有王煊镛、周明泰所作的两种曾巩年谱为这时期最突出的学术成果。而解放后前三十年,曾巩遭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界异乎寻常的冷落,前三十年,全国学术报刊没有一篇研究曾巩的文章,只有几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有点论述。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才渐趋正常,陆续取得一些科研成果,其